

埃伊在海湾地区安全中的关系浅析

钱学文

摘要: 70年代末埃及和以色列单独媾和后, 一度失去了在阿拉伯国家中的领导地位。与此同时, 伊拉克迅速崛起。它利用埃及影响被削弱的机会, 积极争当阿拉伯世界的盟主, 但它在地区霸权主义的道路上走向了反面。纵观20多年来埃及和伊拉克按照各自的逻辑走过的路程, 不难发现, 它们对海湾地区安全的影响和作用是不同的, 从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 它们在海湾地区安全中的关系正好完成了一次交替与转换。

关键词: 埃及; 伊拉克; 海湾地区; 安全

中图分类号: D371 文献标识码: A

埃及自纳赛尔领导的革命取得成功后, 在阿拉伯国家中长期占有重要地位, 发挥了政治领导作用, 在阿拉伯政治事务中的重要性和作用非常突出, 被认为是阿拉伯世界政治、军事和文化的轴心。但是, 到了70年代后期, 前总统萨达特访问圣城, 埃及同以色列单独媾和, 签署戴维营协议, 使埃及失去了通过第四次中东战争在阿拉伯国家中形成的核心地位和威信, 不少阿拉伯国家与之断交, 埃及对包括海湾地区的整个阿拉伯世界的政治领导作用迅速减弱, 影响力一度降至历史最低点。

这时候的伊拉克, 通过政治变革, 确立起了萨达姆的领导地位。萨达姆任总统后, 立刻显示出了不凡的政治抱负, 伊拉克的新闻媒体称他是“伟大的阿拉伯民族英雄”, 其目标是要成为“从阿拉伯湾到大西洋的阿拉伯国家领袖”。伊拉克在萨达姆总统的领导下, 凭借70年代因油价上涨积累起来的巨额石油美元, 依靠苏联和法国的支持, 迅速发展起了自己的军工生产和军事科技, 建立了一支100多万人的军队, 成为海湾地区的军事大国。此时, 萨达

姆称雄海湾地区争当阿拉伯国家领袖的愿望与日俱增, 其势咄咄逼人。

1979年, 霍梅尼领导的伊朗伊斯兰革命推翻了巴列维政府。在伊朗安定好国内, 有能力“输出革命”之前, 海湾地区出现的政治力量短暂失衡使伊拉克感到, 它在阿拉伯世界特别是海湾地区显示力量, 取代埃及, 确立自己的政治优势和霸权地位的机会来了。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它在理论上坚持阿拉伯民族复兴主义, 并提出了自己的民族主义口号, 认为“阿拉伯祖国没有领袖, 伊拉克虽有领袖而非祖国”, 言下之意是, 伊拉克才是阿拉伯世界的领袖, 应由它来发挥领导阿拉伯世界的政治作用。伊拉克还称, 为了实现上述既定目标, 可大量借助物质力量。这个物质力量指的是武力。

在实践上, 自埃及签署戴维营协议后, 伊拉克便利用一切机会到处显示, 在阿拉伯国家中间, 惟有它最有资格和能力担负起所谓的民族主义责任。它将自己描绘成阿拉伯民族唯一的发言人, 在它当时提出的一系列阿拉伯问题

中，最受人们关注的是被伊朗占据的阿联酋三岛的回归问题。伊拉克曾声称一定要实现这一目标，并把它列为必须实现的首要目标之一。有媒体评论说，当伊拉克处处以维护阿拉伯利益的姿态发言的时候，“俨然就把自己当成了阿拉伯国家的领袖”。对于后来发生的两伊战争，伊拉克竭力将它说成是保卫阿拉伯东部领土特别是海合会国家的战争，声称“在伊朗极欲输出革命的条件下，它若战败，海合会国家必陷于灾难。”

从伊拉克谋求在阿拉伯世界发挥政治作用的实践看，它一直坚持着“阿拉伯的”这样一个原则，即它所要发挥的作用是对整个阿拉伯祖国而言的，它代表的是阿拉伯人民的整体利益。在此背后，它所希望的是通过突出自己的作用，抑制埃及在海湾地区政治事务中的作用，而此时的埃及作用因萨达特访问圣城及埃及与以色列单独媾和早已边缘化。即使在抵制伊朗“输出革命”的思想方面，伊拉克也立足于阿拉伯的基础上，即伊斯兰教从根源上说是阿拉伯人的宗教，理由有两点：

(1) 穆罕默德先知最先从阿拉伯人开始将伊斯兰教传向全世界；

(2) 伊斯兰教是通过阿拉伯人的口颁降至阿拉伯土地上的。

伊拉克逐渐萌发填补阿拉伯世界特别是海湾地区政治领导力量空缺的政治抱负，有地区环境和本国经济增长较快两方面的原因。在地区环境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的成功，使巴列维政府时期的“伊朗现代思想”转化成了宗教新政权，鉴于整个阿拉伯地区的政治现状和周边邻国的力量对比，伊拉克对于自己能作为地区政治大国出现感到特别有信心，用它的话说，它的“政权空前巩固，与库尔德人的战争已成过去”。经济上它也感到强大，当时它是海湾地区继沙特之后的第二产油国，1980年外汇储备达310亿美元。伊拉克认为，在1978年

11月阿拉伯峰会召开过后，随着埃及作用和影响的下降，对阿拉伯世界特别是海湾地区的领导已非它莫属，海湾地区应该成为受它控制，任它展现领袖魅力的政治舞台。然而，愿望和事实相悖，伊拉克发展的结果却是在地区霸权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在上述思想指导下，伊拉克积极参与阿拉伯政治事务，进行了一系列的外交活动，也取得了一些成效，如为南北也门调解边界争端，公开谴责苏联入侵阿富汗等，从而在海合会国家中为自己赢得了不少分数。1979年3月阿拉伯外长会议召开期间，伊拉克相信，它已经成为阿拉伯世界和海湾地区的领导者。有学者认为，阿拉伯国家在埃以单独媾和后采取断交行动，实际上是伊拉克对埃及采取强硬立场的结果，其目的就是为了争夺阿拉伯世界的领导地位。当时对埃采取强硬立场的还有利比亚、巴勒斯坦等，但它们执行的都是伊拉克拟定的行动计划。萨达姆于1979年3月27日通电阿拉伯首脑会议与外长会议，说“对埃及没有中立余地，任何人和它合作，都将和敌人以色列合作”。

尽管伊拉克对埃及采取了强硬立场，但是两伊战争一俟爆发，埃及立刻做出反应，义无反顾地全力支持伊拉克，这主要出于以下原因：

1. 基于埃及对阿拉伯各国采取的传统阿拉伯民族主义立场；

2. 除纯粹的民族感情外，与埃及自身利益密切相关；

3. 埃伊均对伊朗新政权试图输出革命的宣传和领土扩张政策感到不安；

4. 两伊战争爆发一年后，萨达特总统遇害，减缓了埃伊间的原有矛盾，有利于恢复双方的关系和合作；

5. 新任总统穆巴拉克渴望带领埃及重返阿拉伯世界大家庭，他尽释前嫌支持伊拉克，

展示出宽阔胸怀，更是为了向所有支持伊拉克的阿拉伯国家示好；

6. 海合会国家的安全、伊朗革命新政权对海合会国家形成的威胁，是海合会国家和埃及所共同忧虑的；

7. 海合会国家特别是沙特、阿联酋和科威特对埃及的劝说和敦促也较紧迫。

从客观上说，埃及虽经历了70年代后期与绝大多数阿拉伯国家断交的风波，但它对于阿拉伯世界和海湾地区的作用实际上依然存在，埃及长期领导阿拉伯世界形成的政治影响难以轻易抹去。

埃及对伊拉克的支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自两伊战争爆发起，两国进行了长期的军事和贸易合作，向伊拉克提供它所需要的苏制武器及其零部件，埃及在同苏联关系疏远之前曾长期接受苏式武器，这些武器和伊拉克军队原先装备的武器相近，有利于伊拉克军队直接使用，据统计，埃及共向伊拉克提供了价值10亿美元的苏式武器；二是向伊拉克提供它急需的接受过培训的劳动力。资料表明，两伊战争期间共有15万埃及志愿者服务于伊拉克军队，其中大多为技术兵种，少数参加了战斗部队。此外，还有150万埃及工人在伊拉克工作，从事各种职业。他们顶替伊拉克工人工作，使伊拉克工人能够轮流上前线参加战斗，使伊拉克的经济发展得到延续和维持。

两伊战争期间，埃及虽然大力支持伊拉克，但对伊拉克声称进行这场战争仅仅因为伊朗要输出革命是怀疑的。它认为，伊拉克在埃及暂离阿拉伯阵营的时候，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在阿拉伯世界和海湾地区获取政治地位和发言权。然而，伊拉克过高地估计了自己，摆不正位置，即使与兄弟的阿拉伯邻国也未能搞好关系，最突出的例子是它和叙利亚的关系，两国在反抗以色列的前线联合不成，最终反目成仇。可以说，两伊战争如果没有埃及和

海合会成员国以及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慷慨支持，伊拉克很可能就会打输。

90年代初，海湾地区发生了震惊世界的海湾危机和海湾战争。穆巴拉克总统领导下的埃及以此为契机，积极参与，通过签署大马士革宣言，和叙利亚、海合会六国及时组成了阿拉伯防卫轴心，为捍卫海湾地区的安全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大马士革宣言的基本目标是根据整个阿拉伯世界特别是海湾地区的安全需要，建设发展阿拉伯防卫力量，填补海湾地区的防卫空白。需要指出的是，大马士革宣言成员国的核心任务是制订阿拉伯防卫体系的新基础和新框架，把海合会六国的防卫任务留给阿拉伯人自己，而不是有可能损害阿拉伯利益的世界大国。埃及资深专家坦塔威博士说：“大马士革宣言是适应阿拉伯安全防务需要的起点。”

海湾危机使埃及重新恢复了在阿拉伯国家中主导地位，其政治作用凸显，如果没有埃及的积极参与，也就难有阿拉伯联合部队和解放科威特的战争。埃及在海湾危机和海湾战争时期为维护海湾地区安全做出了努力，也为以后埃及在阿拉伯世界发挥作用提供了一种可供借鉴的模式。

埃及通过与海合会国家的合作，为自己找回了曾经失落的政治地位。它作为阿拉伯地区大国，和海合会国家的关系较密，鉴于它在阿拉伯世界曾经拥有的传统领导作用和地位，以及和海合会国家共同拥有的深厚的文化渊源与相近的军事、政治实力，从维护地区安全出发，它对以下情况予以了足够的关注。

1. 来自邻国，对海合会国家怀有野心的任何威胁；
2. 不利于海合会国家和阿拉伯国家、可能打破地区平衡的企图；
3. 来自邻国，欲将自己意志强加于人的企图；
4. 强占海合会国家经济资源的企图。

必须指出，埃及和海合会国家共襄地区安全合作，是以互利为基础的。海合会国家都盛产石油，经济利益可观。埃及和海合会国家通过安全合作，顺理成章地带动彼此间的经济合作和交流，显然是埃及发挥安全作用一个期待的结果。

综上所述，埃及自与以色列单独媾和起，一度失去了在阿拉伯国家中的领导地位。与此同时，伊拉克迅速崛起，它利用埃及影响被削弱的机会，积极争当阿拉伯世界的盟主，但它在地区霸权主义的道路上走向了反面。20多年来埃及和伊拉克按照各自的逻辑走过了一段不寻常的路，但对海湾地区安全的影响和作用截然不同，从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它们在海湾地区安全中的关系正好完成了一次交替与转换。

参考文献：

[1] 萨尔瓦特·穆罕默德·沙勒比：《海湾危机：大

众意识和联系方式》，埃及英格鲁书社1991年版，第145页。

[2] 霍达·米特克斯：《危机后的海合会——现实、挑战和前景》，载科威特《阿拉伯未来》第167期，1993年2月。

[3] 阿卜杜拉·朱马哈吉：《伊朗对阿布穆萨岛的占领》，载科威特《社会事务》第52期，1996年冬。

[4] 易卜拉欣·纳菲阿：《大动乱和海湾风暴》，开罗，金字塔翻译出版中心 1993年版。

[5] 阿卜杜拉·朱马哈吉：《阿联酋与国际挑战》（阿联酋战略研究中心咨询报告），阿布扎比，1996年11月24日。

[6] 吉马勒·辛德·苏威迪：《矛盾的三角形：世界格局、美国、阿拉伯》，载于《中东报》（伦敦），1995年11月4日。

[7] 纳比勒·哈利法：《合作委员会和21世纪的阿拉伯》，黎巴嫩贾比勒民族新闻公司1999版。（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